

文化生命的正途（代序）

蔡仁厚

一、弁言：離根拔土三百年

大明之亡，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痛。亡天下者，亡文化也。

這裡所謂文化，不是指器物層的文物器用、人文景觀；也不限於生活層的婚喪喜慶之禮俗與日常生活之軌道；而是指文化理念、文化意識、文化精神而言。要想理解「華族文化隨大明之亡而俱亡」這樣一個判語，我願意採取「明、清」對比的方式，提出三點意思來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第一、明代以「廷杖」摧折士氣，而士氣益厲。清代則由強壓轉為懷柔，士氣反而失去了激發點和支持點。乃漸次形成士心泯失、士氣萎靡之情況。於是知識分子轉成一種「幫閒」（不是幫忙）的「清客性格」，大大地敗壞了中華民族的「士品」。

第二、明代王學（陽明學）遍天下，人人面對自己的「良知、天理」，所以能自覺自主、推己及人，關懷人世之興衰治亂。而清代則以考據為學風，以才藝（做對聯、品字畫、玩骨董）為雅尚，久之，乃造成生命之軟疲、荒涼，而儒聖之慧命（生命的學問）死矣。（按、考據乃為學之方法，當然有其客觀之需要與價值，但不宜張大；文士才藝乃生活之趣味與逸樂，其間雖有美者焉，而並非所以動心忍性、敦品勵學之要。）

第三、明代政治不好，而東西廠之特務尤壞。然而，明代文化土壤中的種子，不斷發芽茁壯，文化生命也活潑有力。清代大興文字獄，士氣摧傷，接著又以懷柔籠絡，文化土壤既為冰天雪地所籠罩，而文化種子亦疲癯發不出芽，真成了「無土失根的蘭花」了。

民國以還，清學之風習依然留存在士人的氣脈血液裡，加上西方強勢文化的

侵襲銷蝕，文化理念模糊不明，文化意識不易激發，而文化精神也發越不起來，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似乎完全喪失了民族文化之自信心。這種情形，到今天依然如故。其中一個最令人痛心的原因，就是自從滿清入關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處於「夷狄入主」的狀態之中（政治、意識形態、價值標準，皆然）。我們「離根拔土」已超過三百年了。

尤其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熱衷於意識形態之爭論，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永無休止，卻又並不重要」的論爭。我鄭重希望大家清醒一點，豁達一點，立即回到我們「真實的生命、純一的心靈」，不要再死心塌地、隨著外方人的魔杖起舞了。須知華族的歷史文化與民族前途，才是「最優先」的。我們應予關切，應加珍愛，以使之「返本開新、慧命相續」。

二、什麼是儒家之本

儒家之本，實際上也即中華文化之本。因為儒家以承續民族文化自任，而又自覺地要求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所以，中華文化之本，與儒家之本，實無二致。儒家的原始經典、代表人物、基本觀念，就某種意思而言，都可以說是儒家之本。但同一個義理系統裡的「經典」、「人物」、「觀念」，事實上又皆依於一個共同的根源（根本）。

1. 經典所記載的，無非就是那個根源體本所涵蘊的義理內容；
2. 人物所踐行的，無非就是那個根源體本所要求的價值原則；
3. 觀念所陳述的，無非就是那個根源體所欲彰顯的理論系統。

據此可知，儒家之本，和「經典、人物、觀念」雖有密切的關係，但本文所說的儒家之本，並不指說任何特定的經典、特定的人物、或特定的觀念；而是指那作為「人文之根、價值之源」的道德主體——仁。

作為道德主體的「仁」，並非只是一個名詞概念，而是指目那徹上徹下的「道德實體」而言之。道德實體內在於人，便稱之為道德心性（道德主體），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孔子以前，這個核心長遠而持續地顯發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以及人民的生活規範上，那就是一般所說的「禮樂」。到周公作了總結，所以歷來都說周公制禮作樂。周公制作禮樂，並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來制作，而是有其客觀而普遍之根據的：一個是二帝三王（堯舜禹湯文武）繩繩相繼的政規，

另一個就是人民的公意。但這裡所說的「人民的公意」，並不是由投票的票數多寡而顯示，而是指人心之同然。所以孟子說：「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註一）聖人依於人心之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制作禮樂，而人民也就自然而然順禮樂而行。這時，外在的「文」（禮樂之形式）和內在的「質」（生命之真誠）自然和諧，人民只覺得禮樂中的規律秩序，正是他內心所要求的、所欣悅的，而並不感到是一種外加的束縛。然而，時間長了，事情都不免會變質變樣。生活在禮樂文化中的人，感性的欲求漸漸冒出來了，心靈的純淨和生命的真誠，也漸漸維持不住了。於是，禮樂徒成形式，不能表現意義，到春秋之時，周朝的禮樂文化終於出毛病了。缺少生命的真誠，當然無法維繫禮樂文化的意義，也無法在禮樂中成就人生的價值和發揮政教的功效。面對這種情形，孔子有極深刻的反省，所以他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二）

禮樂是仁心的顯發，仁心（道德主體）是禮樂的基礎。「人而不仁」，就表示人的道德心靈麻木了，昏昧了，不起作用了。這樣，生命中的真誠也將發不出來。一個人生命中的精誠不能貫注到禮樂之中，又如何能「行禮、守禮」，以善化政治、善化風俗、善化人生？

仁，是眾德之名。每一個德目，都是我們內心之「仁」對應於「人、事、物」而顯發出來的德行。無論孝弟倫常之德，立身處世之德，外王事功之德，以及狂狷之德，中行之德，都是內心之仁隨宜顯發而凝成的人文價值之成果（註三）。社會雖然不斷演變，時代雖然持續推進，但有一點是不會改變的。是即：

人類的理性，永遠要求「真的、善的、美的」文化價值之實現。

人類的理性，可以分從「純粹理性」（理解理性）與「實踐理性」（道德理性）兩面作說明。前者只對價值內容作認知、分析、理解，卻不負責實現價值和創造價值。後者才內發自發地要求價值之實現和價值之創造。孔子所講的「仁」正是後者，屬於道德理性，它能顯發價值、創造價值。這個作為「人文之根、價值之源」的道德主體（仁），就是儒家之本、中華文化之本。所謂「返本」，就是要回歸於這個創造性的根源之地，以重新開創中華文化的浩浩前程。

三、什麼是文化之新

文化的內容，有的因襲下來，有的革而去之，有時有減損，有時又有增益。如果文化之「新」是指這些隨時出現的內容成果而言，那就只是時間流裡面很普通很自然的事實，我們只要去認知它、理解它就行了。但今天我們提出文化「開新」，卻並不是就這種實然層的事實而說話，而是從「應然」的層次，來思考文化的新道路。

在人類古文明中，中華民族所開創的文化，雖不是最古老，但卻最源遠流長。關於中華文化（以儒家為主流）最基本的宗旨原則，筆者五年前應約出席日本「東方思想前瞻年會」宣讀論文時，曾揭示八大端，以略見儒家思想之綱領。（註四）

1. 人性本善的「道德動源」（善出於性，理由心發）
2. 天人合德的「超越企向」（下學上達，與天合德）
3. 孝弟仁愛的「倫理思想」（敦親睦族，仁民愛物）
4. 情理交融的「生活規範」（以禮為綱，以法為用）
5.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人生智慧」（以理逆勢，據理造勢）
6. 因革損益、日新又新的「歷史原則」（守常應變，與時俱進）
7. 修齊治平、以民為本的「政治哲學」（好民所好，惡民所惡）
8. 內聖外王、天下為公的「文化理想」（成己成物，世界大同）

文化之「新」，正是從上述基本宗旨凝成之文化原則與價值取向中，隨順事理之宜與時代要求，以決定文化生命的走向；再從新的走向中，昭顯民族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新」。

從十七世紀中葉滿清入主，華族的民族生命遭受大挫折，文化生命遭逢大歪曲，演變至二十世紀，可以說是「混亂極矣，衰微極矣」。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不但不能承續光大，而且根本就斷了線，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智慧的方向和義理（思想）的能力。當一個民族不會運用思想，只靠生物的本能和世俗的聰明來圖存於世界時，那就很危險了。一個失去傳統的民族，當然也就沒有文化之可言了。當前中華民族面臨的麻煩，看起來彷彿千頭萬緒，紛繁複雜，而實質上則仍然是一個「文化問題」。無論「立己、成己」一面的內聖成德之教，或者「立人、成物」一面的外王事功之學，也都是文化中事。這是人類永恆的問題，無可躲閃。

第一、內聖成德一面，乃是永恆的人生問題。如何表現生活的意義？如何完成生命的價值？這個問題，每一代人都要面對。用西方的詞語說，這是終極關懷的問題；用中國的老話說，這是安身立命的問題。在以前、儒、道、佛三教都提供了解決的途徑，而以儒家的道路最爲平正而通達。如今，加上西方宗教的沖激，問題變得更複雜了。十年前，筆者曾就其中相關的問題，歸結爲宗教會通的六個焦點，提出來和基督教方面作過廣泛的對話。（註五）這和儒家內聖之學的新開展是相互關涉的。

第二、外王事功一面，實質上就是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集中在二個綱領上。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知識問題。政治方面是「民主政體」建國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化最爲本質的一步，這一步完成了，就會有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的社會，因而科學知識的問題也連帶地比較容易解決。（註六）而完成民主建國和發展科學知識，也正是儒家新外王的二大綱領。

文化必須通過實踐而完成。主觀面的實踐，是要求縱的提升（通天人），以成就生命之「質」的高明純一，這是內聖一面的基本目標。客觀的實踐，是要求橫的開擴（通物我），以成就生命之「量」的廣大博厚，這是外王一面的基本目標。時至今日，無論內聖或外王，都必須有進一步的充實開擴。而主觀面的新內聖和客觀面的新外王，二者融會而成的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就是中華民族開發出來的文化新機了。

四、爲什麼要「返本」而「開新」

有人問，既然要「開新」，又何必再「返本」？那豈不是開歷史倒車！老實說，這樣的問話是沒有道理的。

「返本」不是復古，更不是開歷史倒車。有些人見到「本」、「根」、「源頭」一類的字眼，就感到不舒服，以爲用這些字就表示頑固守舊，故步自封。這是國人喪失文化自信之後，心態失衡，所以才會有這種自卑敏感的反應。因此，我在第一節便首先解釋什麼是儒家之「本」，以免大家望文生義，形成誤會。其實，回到本根才會滋生發芽，這應該是很普通的道理。而文化上的「返本」，就是要回歸「以仁爲中心」的文化傳統，暢通「以仁爲本根」的文化生命。如果我們不能重新開發「源頭活水」，中華文化的「滾滾江流」就將有枯竭乾涸之虞。

仁，是我們鮮活的道德心靈，是我們真實的德性生命，這是一切道德價值和文化價值的本根。(註七)我們如果不能回歸到生命的本根，則一切高論美談，皆將成爲空想而幻滅。

至於「開新」，倒是人人都贊成。但開的是什麼新？「新」指什麼而言？卻又見仁見智而莫衷一是了。這些，我們且不管他。如今我只就自己的理解，把當代新儒家所說的「開新」，分爲二點作一說明。

第一、所謂「開新」，是要拓展新的文化道路，使「真、善、美」交融會通，同時予以成就。這一個原則性的說明，非常重要。有了這個原則，便可以避免宗教上的排他主義，以及學術知識上的「唯理智」「唯科學」之偏執。而「道德宗教、文學藝術、民主科學」，也因而可以同時成爲文化價值中的重要內容。

第二、所謂「開新」，是要開發新的文化內容。五四運動之同時，又有所謂新文化運動，其內容歸結爲「民主」與「科學」。(註八)但一個國家民族，不能僅僅重視「政治、知識」。而且民主的實踐和科學的發展，都必須以「公益」爲目標，以完成人文世界中事業價值之多元並立。文化的內容，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大小、高下、剛柔、動靜……皆須一一成就。這才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註九)的道理。

以上兩項「開新」，都是中華民族自己的事，不能靠外國人替我們去完成。所以新的文化道路與文化內容，都必須回歸於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源處，才能開得出來。這就是「開新」必須「返本」的道理了。

天地間不可能有「無本之新」。沒有本根，何來枝、葉、花、果？凡是從外面拾掇而來的，都是和自己生命不相干的。不是「根生土長」的東西，絕不可能長久。西方的近代文明，以「民主、科學」爲主綱。這是文化中間層的東西，西方先有了，我們也要有，以前沒有，現在我們決定要有。但這不能從別人手中拿過來，每一個民族都必須自己去成就，你成就它，它才是你自己的，才能成爲民族文化中的新內容。否則，便只是「稗販」而已。稗販而來的東西，既不是自己生產的，也不是自己創造的，當然更說不上是文化開新了。

五、文化生命的正途：返本以開新

在上文的敘述裡，我們已經分別提到中華民族當前的文化問題，不外下列三大綱。

第一綱，內聖成德之教，也就是心性之學。儒、道、佛三家都有其獨立的心性之學。其中儒家是道德的進路，應該是心性之學的正宗。心性之學的目標是成德、成聖賢。儒家既然認為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就必須面對成聖成賢是否真實可能的問題。儒家當然認為可能，但可能的根據在那裡呢？儒家講「本體」，（道體、性體、心體、仁體、以及良知天理等）就是為了建立道德實踐所以可能的「超越而客觀的根據」。這是人人一樣，無不具足的。在本體問題之外，儒家又講「工夫」（為仁、守約、慎獨、求放心、明本心、致良知等），則是為了開顯道德實踐所以可能的「內在而主觀的根據」。工夫的進路可以有共同性，但工夫的實踐則完全是各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幫不了忙；孔子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十）便是這個意思。儒家這一套內聖成德之學，不但有久遠的傳統，而且有永恆的意義。雖然二十世紀以來，內而慘遭不肖子孫之誤解醜詆、摧殘糟塌，外而遭逢西方宗教與各種觀念系統之挑戰擠逼；但俗話說得好，「真金不怕火煉」，而且越煉越純，越煉越亮。到底什麼樣的路道，最能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在以往「儒道佛」一二千年的摩盪中，大家已經漸漸明白過來。從今以後，將轉為「儒、佛、耶」三教的摩盪過程。結果如何，無法預知，也無須猜測。我只想在此提醒一句：相互觀摩激盪，決非拼生死、分勝負，而是分判異同，進而相互融攝，以期化其異而趨於同。到最後如果仍然有異而難以消解，我們便應該記取孔子的話：「君子和而不同」，而千萬不可以為了「強求其同」而成為「同而不和」的「小人」。（註十一）

第二綱，問出知識之學。中華民族有很高的科學心智，而且自古以來也持續有高水準的科技發明。但我們仍然願意承認，中華文化欠缺一個「知識性的學術傳統」。以筆者之見，這是關乎民族文化心靈表現形態的問題。數千年來，華族文化心靈的表現是以「德性主體」（道德心）為主綱，而「知性主體」（認知心）則一直在德性主體的籠罩之下。未能充分透顯以獨立起用。所以，二千年來的學術，一直是以「成德」為中心，而從未以「成知識」為重點。華族本來可以開出知識之學的傳統，而終於未曾開出者，非不能也，乃未嘗專力為之而已。如今

，民族文化心靈已經有了這步醒覺，以前沒有的，今後可以使它有。更何況在儒家學術中也原本就有現成的思想線索。先秦荀子和南宋朱子所講的「心」，正是作為知性主體的認知心；只因他們持守儒家「道德的進路」，而並未以知識為中心，所以仍然沒有發展出科學。今天我們反省文化生命的走向，既已確定知識之學的重要，自須調整文化心靈的表現形態，使中華民族能夠自本自根地開出科學。這是一步「相順的發展」，不但「理所應然」，而且「勢所必至」。若以近世儒學中的朱子與王陽明為代表，也同樣可以疏導「開出知性學問」的理路。

- 1.朱子的「即物窮理」，本是要窮究事物之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性理），以成就德、成就善。如今只須轉換一下，去窮究事物之內在的所以然之理（物理），也即直接窮究（認知）內在於事物本身的「質、量、關係」，就可以分別做成知識報告以開出科學。（註十二）（按、思想觀念疏通之後，具體落實的工作，自與西方並無二致，不過如今是華人自己來做，主動來做，不再是西方的跟班，也不屑於做別人的「買辦」了。）
- 2.王陽明的「致良知」，本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律則）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得到良知天理之貫注潤澤而得以各得其宜、各得其正、各得其成。這雖是成德成善，與成知識並不相關，但良知是個活體，它永遠在具體感應中，如今良知已感應到知識的重要與必要，當然就會要求成就知識；但良知心體「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它不會把事物推出去作為知識的對象，所以良知不能直接成就知識，而必須自覺地作一步「自我坎陷」（從「與物無對」的道德心之絕對體的地位，降到「與物為對」的認知心之相對的地位），而後乃能以認知心之身分，在「主客對列，心物相對」的格局之中進行認知活動，以開出知識之學（註十三）

據以上簡要的陳述，可以看出從儒家開出知性學問，本就是一個「相順的發展」，並沒有思想上的困難，也沒有觀念上的牴觸。國人如能一念醒悟，則數十年來的糾結誤解，可以一掃而空，而民族文化心靈在通達條暢的情形下，「德性主體」與「知性主體」自能兼顧並重，相輔相成。

第三綱，政治上的「政統開新」。三百年前，華族在政治上的表現，其實是領先其他民族的。但中國傳統政治卻有三大困局，一直未能解決。(1)朝代更替，治亂相循。自堯舜禪讓，到三代世襲，又引發湯武革命，下及秦漢，竟形成「打

天下」之局面。這表示，在「政權轉移」的問題上，始終建立不起客觀的法制。

(2)君位繼承，宮廷鬥爭。這是從第一困局滋生出來的第二困局。君位傳嫡乎？傳賢乎？各有利弊。歷來雖以傳嫡為常規，但也不時出現變故，而造成骨肉之相殘。

(3)宰相地位，受制於君。宰相制度本是華族在政治上很光榮的成就，但那只是治權層次上的制度。而政權方面卻欠缺客觀的制度來限制君主之專制獨裁，所以宰相常常受制於君。以上三大困局，在近代西方發展完成的民主政治中卻一舉而消解了。這是民主體制最大的效益所在。但五四以來，國人只著眼於政治的活動與民主政治的「內容」（自由人權），而卻疏忽了作為鋼架的「體制」。體制不立，內容必無保障。建立民主憲政的體制，才是建國大業的關鍵所在。只要鋼架定了，內容方面隨時都可以調節充實。

以上三件大事，乃是華族文化生命發展的正途。因此，都必須回歸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開創新機。

六、結語：由會通到達時中

文化的會通，其實並非時髦之事。人類自有文化以來，各種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統就不斷有接觸、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會通。其中的差別，不過主動與被動、自覺不自覺的不同而已。

就二十世紀的中華民族而講文化會通，一方面是「被動的」，一方面卻又是「自覺的」。中華民族是在西方的軍艦大炮和政治經濟之強力威脅下，心不甘情不願地被逼上會通之路，這當然是被動的。但等到中國人發現西方在船堅炮利之外，還有政法制度、學術思想上的優長，於是西方一下子變成上國、變成先進，而「全盤西化」或「中西會通」的論調便先後由國人自覺地提出來了。

健康正常的會通，是「體常」而「盡變」，必須常中有變，變不失常。千變萬化之後，它必須仍然是中華文化，而且必須順時合宜，以得其時中。

當代新儒家最基本的貢獻，是他們大致做到了四件事：

1. 釐清了中國哲學演進發展的思想脈絡；
2. 分判了中國哲學異同分合的義理系統；
3. 闡釋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義旨及其價值；
4. 開出了中西文化融攝會通的義理規路。

這四個問題，一直困擾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界，而當代新儒家的努力，可以說已經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紀困擾」提供了根本的解答。同時也為華族文化生命的走向，確立了「返本開新」的三大綱領（詳見上文）：

第一、光大內聖成德之教，以重開「生命的學問」。

第二、開出法制化的「政道」（安排政權之軌道），完成民主政體建國。

第三、調整民族文化心靈的表現形態，以自本自根地開出知識之學。

最後，我再提醒一下：今後中華文化是否有光輝的未來，其決定性的因素有二：

一、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義理綱維，能不能重新顯發出來？能不能重新挺立起來？

二、中華民族能不能如像當初消化佛教那樣，來消化西方的哲學和宗教？

如果能，中華民族就有前途，中華文化也將充實開擴，再顯光輝。

附 註

- 註 一、《孟子》告子上篇第七章。按，亘然，猶言共同認可，共同肯定。理、義，是人心共同認可而欣悅的。南宋大儒陸象山即據孟子之意，引申為「此心同、此理同」之說。至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是後人歸結而成之語句。
- 註 二、《論語》八佾篇。
- 註 三、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84），頁83～99。
- 註 四、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頁165～180。
- 註 五、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71～90，〈關於宗教的會通問題〉。第二篇〈再談有關宗教的會通問題〉，編入《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頁373～397。
- 註 六、蔡仁厚《儒學的常與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上卷，頁1～100，共六篇文字，皆討論有關儒家與中國現代化之問題，請參閱。
- 註 七、拙著《孔孟荀哲學》卷上、孔子之部，第三四十五章皆討論孔子之「仁」，請參看。
- 註 八、按、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其口號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新文化運動則是散而持續的文化反省，等到歸結出「民主、科學」二個要點之後，乃被稱為新文化運動。
- 註 九、《周易》乾卦彖辭語。在乾（天）道變化生生之中，萬物得以各自正其性命，大者成其大，小者成其小，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各得其所。同理，文化世界的一切價值，也要一一成就，以各定其位，各安其分，各得其理，各盡其用。
- 註 十、《論語》顏淵篇。
- 註十一、《論語》子路篇載孔子之言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註十二、參閱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荀朱心性思想的時代意義〉（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頁123～127。

註十三、參閱蔡仁厚《王陽明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74），第四章〈良知與知識〉，頁56～76。

韓儒曹南冥的性理學說及其精神特徵

蔡仁厚

壹、前言	\14
貳、南冥的性理學說	\14
一、南冥〈學記類編〉的性質	\14
二、〈學記〉諸圖顯示的義理性格	\15
三、從性理學之立場看諸圖之義旨	\18
甲、論「道之統體」者	\18
乙、論爲學之要者	\20
四、南冥儒學造詣的兩個面向	\22
1. 服膺朱子，而不以朱子學自限	\22
2. 信守儒道，而又逸出儒門之外	\22
參、南冥的精神特徵	\25
一、高邁英發，氣豪心靜	\25
二、雪月襟懷，江湖性氣	\27
三、嚴於出處，不肯苟從	\29
肆、餘韻：鄭寒岡之孺慕與疏請從祀文廟事	\31